

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革命教育丛书

啊，长征

血染军徽——西路英魂

长征诗三首
红军不怕
远征难，
万水千山
只等闲。
五岭逶迤
腾细浪，
乌蒙磅礴
走泥丸。
金沙水拍
拍

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革命教育丛书

啊，长 征

血染军徽——西路英魂

张牡丹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染军徽:西路英魂/张壮壮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8

(啊,长征)

ISBN 7-80131-086-1/K·2

I. 血… II. 张…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
1936)-史料 IV. K2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455 号

前 言

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得救。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虽然六十年过去了，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忘记长征。长征精神永存，长征烈士永生。

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为迎接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纪念日，为配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振奋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培育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全国党史研究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专业研究人员联袂编辑了这套全面反映长征真实过程、经历、事件、人物以及各次战役的纪实性丛书。旨在再现长征伟业，告慰先驱，激励后人。

这套丛书遵从历史事实，为读者描述了长征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并对红军在长征途中复杂的军事斗争作了真实的写照，读后催人奋起，令人感慨万千。丛书内容扣人心弦，动人魂魄，发人深省，将对青少年继承长征精神，缅怀先烈，砥砺斗志产生积极作用。

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以真实为第一原则，以实录为主要形式，丛书内容均从浩瀚纷繁的四十余年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献中，精选并按新的构思进行编辑整理。为统一丛书的编辑风格，我们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章的标题略作改动或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必要删节和修改，并统一了丛书各册内容的编排形式。由于丛书在出版前无法与某些作者进行联系，故请这些作者在丛书出版后，与出版社、丛书编委会联系，我们将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

丛书在主题设计、内容选编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平、杨成武、肖克、李德生、陈锡联、廖汉生、方强、莫文骅、黄新廷、梁必业、杜平、杜义德、孙毅等人的支持、鼓励和指导，并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新华社、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在此，谨对一切关心支持帮助丛书编辑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啊，长征》丛书编委会

1996年7月

丛 书 编 委 会

主 编 穆 宪

编 委	穆 宪	刘红松	王 薇
	洪 明	韩庆祥	佟 竞
	刘卫平	向 青	贾秀娟
	吕晓军	李联仲	赵 平
	沈雁英	李五一	杨 华
	张要先	张晓莹	聂北茵
	段 跃	张潘仕	张禹宾
	方卫国	苏南樱	叶红征
	廖绍军	伍东平	赵旭东

目 录

回忆西路军·····	(1)
历史的追溯·····	(20)
甘孜风云·····	(29)
转战甘西北的西路军·····	(35)
气壮山河·····	(49)
——西路军远征记	
苦战临泽·····	(96)
血战“河西走廊”·····	(103)
最后的几匹战马·····	(121)
回到党的怀抱·····	(126)
陷入绝境之后·····	(132)
从祁连山到陇东·····	(137)
历史的结论·····	(166)
附录·····	(169)

回忆西路军

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了由“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的作战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 指 军：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 谋 长：李 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卫生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十四师（师长郭锡三，政治委员谢良）。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

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85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

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401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結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估

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而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散开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守，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不胜。但

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的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

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

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1080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得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的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本文引自《历史的回顾》 作者：徐向前）

历史的追溯

野心勃勃张国焘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后，长期蓄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极力倡导组成西路军向甘肃、宁夏以西地区挺进。在此后的岁月里，西路军经历极为艰难的战火考验，虽败犹荣，描写下了一幅壮丽的诗篇。为了主面揭露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首先还要看看张国焘是怎样走上分裂红军道路的。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一个老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参加党的初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他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阴谋家，因此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并不奇怪。党内出现张国焘、王明这类野心家、阴谋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训。

张国焘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并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